

# 中西体育文化的差异客观存在 ——与万义、白晋湘商榷

赵京辉<sup>1</sup>, 韩坤<sup>2</sup>

(1.中国石油大学 体育部, 北京 102249; 2.浙江财经学院 体军部,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 对《对“中西体育文化差异论”的质疑》一文的相关论断和方法论提出质疑, 指出该文存在的若干“硬伤”: 第一, 将西方中世纪下限定在公元 1350 年; 第二, 强行对斯格勒的理论“削足适履”。同时认为, 不能将依附于宗教形态的身体活动形式作为中西体育的共同起源; 运用斯宾格勒“比较形态方法”进行中西体育文化比较研究不可取; 中西体育文化的差异客观存在。明辨、承认中西体育文化之间的差异, 有利于我国传统体育的保护与发展。

**关 键 词:** 体育文化; 文化差异; 方法论; 中西方文化比较

**中图分类号:** G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8)03-0013-05

## Objective existenc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s ——A discussion with WAN Yi and BAI Jin-xiang

ZHAO Jing-hui<sup>1</sup>, HAN Kun<sup>2</sup>

(1.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102249, China; 2.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 Military,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raised several queries about relevant conclusions drawn and the methodology used in the article of Queries about the “theory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s”, pointing out that there are several “critical mistakes” in the article: 1) the lower limit of Middle Ages was set to a.d. 1350; 2) the Spengler theory was applied in a Procrustean way. The authors also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the pattern of physical activities attached to a religious form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the common origi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s;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mak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s by applying the “form comparison method” set forth by Spengl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s exist objectively. It is conducive to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port to identify and admi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s.

**Key words:** sports culture; cultural difference; methodology;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在文化学研究中,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 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差异; 同样毋庸置疑的是, 体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分支与表现形态, 中西方文化之间的许多差异也必然在中西方体育中表现出来。

《体育学刊》2007年第2期刊登了《对“中西体育文化差异论”的质疑》(以下简称《质》文)一文。该文对目前学术界普遍赞同的“中西体育文化差异论”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 “从文化根源上来说, 西方体

育文化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一样诞生于农耕文明, 这两种文化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 中西体育文化特征差异, 是由于同一种文化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是处在农业文化形态和工业文化形态所表现出的差异。目前对中西体育文化差异的相关研究, 是把原本就为同一种文化的两种不同发展阶段, 强行划分为两个独立的、完全对立的部分, 其实质是用静止的、片面的、孤立的眼光来看待问题。”<sup>[1]</sup>对《质》文的以上观点以及原作者运用斯宾格勒的“比较形态方法”来

分析中西体育文化之异同的研究方法,笔者不敢苟同,提出一些看法与原作者进行商榷。

## 1 对《质》文研究逻辑起点的质疑

通览全文,《质》文的逻辑起点可以归结为:中西体育文化是“同一种文化的两种不同发展阶段”。《质》文认为:“如果拿目前的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进行比较,确实能体现出两种文化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作者看来是“因为目前我们国家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度的阶段,与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比较显著”。《质》文对中西体育文化的这种论断,完全是一种“经济基础决定论”的观点。

诚然,文化创造与变迁固然不可能脱离经济基础,但即使拥有完全相同的经济基础,不同的民族也不可能创造出完全相同的文化。文化创造除了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之外,还会受到社会政治结构、风俗习惯、居住环境、文化传统、时代精神等所构成的“文化框架”的巨大影响。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sup>[2]</sup>恩格斯还以大量事实说明,把社会政治状况、经济水平同文化发展“对应”起来是不正确的。例如,18~19世纪的德国,整个社会“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经济“极端凋敝”,然而文化上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气象,文学、艺术、哲学空前繁荣,出现了歌德、贝多芬、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一批世界文化巨匠。毋庸置疑,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体育活动便难以开展,雏形的体育也就难以成熟。但是,我们又无法将体育走向成熟所要求的“起码的经济条件”量化,指出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何种程度,工业化达到什么程度,体育才能产生、发生转变。更不等于说,只要具备了“起码的经济条件”就一定会有中国传统体育的现代转变,中国传统体育和西方体育之间的差异绝非完全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其次,《质》文这种“经济基础决定论”的论断,完全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不同的人类群体由于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的差异,以及由地缘因素带来的不同的文化共生关系的影响,常常形成不同的价值系统、思维模式和行为倾向。在此基础上,便产生了使某一社会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文化特质,一组文化特质在一定的条件和范围内聚合起来,就可

能构成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乃至文化形态<sup>[3]</sup>。就体育而言,全世界整体的体育文化正是包容了许多互有差异的具体文化类型,正是由于不同民族和地域文化系统的存在,才形成了多样性的体育文化形态景观。例如古希腊的竞技体育,印度的瑜伽,中国的导引养生功、五禽戏等等。中国与希腊地理环境的差异,在此不必多说,差异是巨大的,地理学上有详细的阐述。可以肯定的是,地理环境的作用与影响,对中西两种身体活动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特殊的地理文化背景,使其民族不可能产生出普遍的以争斗、征服为标志的体育活动,进而也不能导致普遍的体育竞技,最终也就不可能自觉产生出类似希腊那样的奥运会或者严格立法意义上的竞技运动<sup>[4]</sup>,而诞生了大量的绵缓性运动形式,如太极拳、导引功、养生功等等。而在古希腊,则完全不同,希腊人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诞生了与生俱来的“动”的习性,诞生了角力、赛跑、跳跃、投掷等具有竞技倾向的体育运动形式。因此,我们决不能否认地理环境对文化产生的这种影响作用。《质》文恰恰是完全抛弃了文化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特征,因而,才得出中西两种不同的体育形态是“同一种文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错误结论。

## 2 对《质》文若干观点的质疑

### 2.1 中西体育都曾是依附宗教文化的体育?

《质》文认为,“现在被认为具有独立文化形态的中西方体育,在远古都是依附于宗教的一种祭祀礼仪和活动形式”。

谭华教授<sup>[5]</sup>认为:“人类对人体运动与人类自身自然变化之间内在联系的自觉意识,并不是在文艺复兴以后突然发展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自发、自在、自觉逐渐发展到自为的复杂过程。”“在原始宗教中,逐渐形成了源于劳动、军部落酋长产生过程和游戏性身体活动等的仪式化活动。这种仪式化的身体活动带有图腾祭祀或祈神的性质,还具有强烈的为劳动或军事等目的服务的功能,但它已经脱离了直接的劳动或军事过程,已经表现出如今人所认识到的体育的基本外在形式和基本功能……但尚未具有独立的存在形式和独立的价值,仍属于原始文化的共同体之中。如果说这个时期有‘体育’的话,那也是一种自发而渐次为自在的,即完全没有被人类意识到的一类活动。”<sup>[6]</sup>透过这段论述,可以清晰地看出,《质》文所说的在中国上古所产生的各种舞蹈,只是“一种自发而渐次为自在的,即完全没有被人类意识到的一类活动”。因此,不能将它们称为“体育”,只能说是“潜在的体育”。不仅如此,“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人类逐

渐积累了大量的有关身体活动与身心变化之间联系的经验知识,古希腊时期体操学校里的儿童实施的教育,古代奥林匹克祭祀中的竞技和为奥林匹克竞技进行的训练,中国古代的五禽戏、导引术等,都是这种经验知识的体现。”<sup>[6]</sup>也就是说,在人类文明由天然经济基础上的原始文明向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的转变过程中,体育发生了质的改变,即由原始自在的体育向经验体育的转变。

进行中西体育文化比较,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必须建立在这两种文化内在的某些属性或特征已经完整地彰显出来,能够被人所认知。而此前的“模糊”状态,是不能作为两者比较的立足点的,更不能将两者的“模糊”状态看作是共同的起源。在古代,“依附于宗教文化的体育”只能是一种活动形式,而且,这种活动形式是“蒙昧”的,还不被人所认知,不是“体育”。因而,中西体育都曾依附宗教文化的“体育”的观点也就不能成立的。

## 2.2 中西体育都曾强调群体本位的体育?

《质》文认为,“儒家伦理对人生的目的和任务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个人的修身只是作为手段而存在,个体只是作为群体的附属物而存在,国家的治理和天下的太平才是最终的目的。”在西方传统文化中,“国家优先于个人,个人从属于国家”。因此,“在远古,中西方体育都曾强调群体本位的体育”。如此论断,笔者认为也不妥。

儒家文化里倡导的群体本位,恰恰是一种个人主义。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说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表面上看起来,是以国家为重,其实质恰恰落在了“修身”的基础上。“虽然有兼济天下的道德,然而终苦于无法下手,无力实行,只好仍旧回到个人的身心上用功夫,做那些内向的修养。越向内做工夫,越看不见外面的现实世界……即如中国八百年的理学工夫居然看不见2万万妇女缠足的惨无人道!”<sup>[4]</sup>由此可见,“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就是主张群体本位”的说法就值得大大怀疑。以群体本位的个人,居然看不见社会现实,看不见妇女缠足的恶劣现实。说到底,人人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中国传统体育中的武术、太极拳等等,无不表现为个人主义。武术和太极拳帮派林立,门户之见极其严重。表面上看,中国古代强调群体本位,骨子里却是个人主义。

《质》文“西方体育文化自古强调群体本位”的观点同样值得质疑。在经济基础上,西方世界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形成了农业、手工业、商业并重的经济结构,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都十分发达。随着工商业阶

层的崛起,以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商业原则促进了希腊人个体意识的觉醒和成熟,由此孕育出西方个人本位的文化精神。可以说,正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根本利益,于是调节人与人之间财产关系的私法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先期产生。因为奉行个人主义原则,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假如没有一定的规则来约束个人的欲望,个人就难免会对别人的利益进行损害。这就是西方私法产生的根本人性基础,同时,也深刻的反映出西方社会的个人本位主义文化传统。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sup>[6]</sup>对西方文化有一个精妙的论述,他说“西方社会表面上虽以国家为基础,骨子里却偏重个人主义。”正因如此,才在古希腊诞生了大量的个人竞技项目,只是随着工业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要求合作,讲求配合、分工,于是又诞生了大量的集体类项目。

## 2.3 中西体育都曾是非理性的体育?

《质》文认为,“现在既具有独立文化形态,又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西方体育,在远古都是非理性的体育”。此论断,同样也不妥。

首先,关于中西体育之间的差异,学者李力研<sup>[7]</sup>有很多精妙的论述。“希腊体育都是‘立法’体育,就是说体育的所有比赛都有仲裁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好多人研究体育看不到这一点,老以为希腊人有体育,我们中国人也有体育,于是就开始比较,比较来比较去,结果差不多,你有的我都有,你有跑跳投,我有大力士;你有田径,我有杂耍。所以,我在体育问题上也就无需‘言必称希腊’了,可以理直气壮地坚持民族传统了。殊不知,还是没看到问题的本相。”问题的本相是什么呢,他认为,“东方体育属于‘没有立法的体育’,一切希腊体育都是‘立法体育’”。立法,肯定算是理性吧,没有立法,肯定就是非理性了。与希腊人不同的是,“中国即使有体育的萌芽,王子与平民,皇上与百姓,也决没有法权上的平等,自然他们不可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赛跑。”<sup>[7]</sup>

其次,撇开原作者许多富有“文采”的中西文化中非理性的论述,我们以常识来进行判断,看看西方体育在中世纪以前是否是非理性的。西方为何要进行文艺复兴?就是因为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实行禁欲,压抑人性,贬低人的价值与尊严。因而,人文主义者倡导文艺复兴,就是要恢复古希腊自由、民主,恢复人性,重新发现人的价值与尊严。要说西方体育非理性,只能说是中世纪存在着非理性,宗教崇拜压抑了理性,而在中世纪以前的远古,在古希腊,体育中处处张扬着理性。希腊体育是立法体育,讲求规则、讲求公平、讲求仲裁,重视肉体,这应该都是实实在在的理性,而不是非理性。说西方体育是非理性的,

真是荒谬。说中国传统体育存在着非理性，倒是成立的。武术，作为国粹，倡导的是“夏炼三伏，冬炼三九”。为什么要这么做？没有依据。没有依据的东西，要么是神秘主义，要么就是胡来，总之，不科学。而在西方，在古希腊，早就破除了这种神秘主义，身体锻炼讲求卫生，讲求科学，讲求营养。将中西一对比，就能看出作者“中西体育都曾是非理性的体育”的观点显得十分荒谬。

#### 2.4 中西体育文化都曾是非理性的体育？

笔者比较认同中国传统体育是内敛的体育的说法，在此，不展开论述。然而，“西方体育也曾是非理性的体育”吗？

西方体育自始至终都是强调竞争的，即使在被称为“黑暗时代”的欧洲中世纪，其体育也没有消亡，也还保留着决斗的风范<sup>[7]</sup>。“中世纪以后的西方体育文化宣扬的是竞争，是个性的张扬”，而中世纪以前的西方体育，则应该包含一个古代体育。这个古代，具体到希腊，可以说是典型的强调竞争，强调个性的张扬，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只是因为中世纪的“黑暗”，基督教的压迫，才使得这些“光芒”被掩盖了许多，但远没有消失殆尽。古代奥运会倡导的就是竞争，就是取胜，所以，决不是什么内敛的体育。看一看古代奥运会对参赛者的训练与要求，就知道希腊体育决不是内敛的体育。在斯坦利·霍夫曼编著的《自由教育丛书》中关于古希腊奥运会有这样的描述：“在赛前，竞技者须按规定进行10个月的训练。他们先在自己的城邦里训练9个月，在临近比赛的最后1个月，必须到伊利斯最大的体育场向裁判员报到。竞技者接下来将在裁判员的监督和指导下，进行艰苦和严格的训练，并最后接受裁判员的考察，以决定是够有参赛的资格。”<sup>[8]</sup>如此严格的规定，怎么能说是内敛的体育？

### 3 运用“比较形态方法”进行中西体育文化比较研究不可取

在方法论上，《质》文的作者采用了西方学者斯宾格勒（以下简称斯氏）的“比较形态方法”。“在对历史上盛衰交替的各大文化发展的论述中，斯氏将生物学原理应用于历史研究，把这些文化看做彼此独立、相互隔绝并且受生命周期限限制的有机体。”<sup>[9]</sup>在斯氏看来，文化的发展类似于有机体的生命，具有诞生、生长、成熟和衰败的周期性特征，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摆脱这种周期性的命运。事实上，斯氏无形中为文明编制了一个封闭的宿命论的时间周期表，采用这种比较形态方法对中西体育文化进行比较是不可取的。

按照斯氏的观点，任何文化都要经历一个从发生

到成熟，再到衰老的过程。体育诞生于何时，我们在这里可以暂且不论，体育在当今中西方，实实在在的存在着、发展着，那么，是不是中西体育也如斯氏所说的一样，必然走向灭亡呢？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体育对人类社会具有重大的价值。无论中西体育在运动形式上有多大差异，增进健康、增强体质、愉悦身心的目的是共同的。而且，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特别是在当前知识经济日益高涨的今天，文明的发展已经给人类带来诸多影响，有积极的，也有负面的影响。体育运动在对抗文明病，关照、监控和提高人的生命质量，乃至生活质量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许多其他活动不可替代的。因此，体育不可能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消亡，不仅如此，体育还会随着文明的进步发挥着更大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斯氏“文化有机体”的观点至少对体育文化是不能成立的，而基于“文化有机体”的认识，采用“比较形态方法”对中西体育文化进行比较的做法就显得十分荒谬。事实上，在斯氏随后的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已经认识到了斯氏这种文化宿命论观点的错误，汤因比认为：“文明根本不受生物学法则的约束，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文明的灭亡也不是一个必然的命运。”<sup>[9]</sup>

### 4 《质》文存在若干硬伤

首先，为了说明中西体育文化之间的“生存同期”性，作者将“目前的中国传统体育与公元1350（即西方近代史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大运动改革）以前的西方体育”进行相比。虽然作者没有明确的说出，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推论出，在这样的条件下，作者认为，中西两种体育文化都将处于农业社会，因而，就能有效地规避“在逻辑上把处于农业文化发展阶段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处在工业文化发展阶段的西方体育文化进行比较”的“方法论错误”。然而，公元1350年以前的西方，并非就是《质》文反复强调的“中世纪”。在历史学中，中世纪的具体时间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中世纪一词最先是由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家比昂多于15世纪提出来的。他把西欧5~15世纪的那一千年叫作中世纪，意为古典文化与文艺复兴这两个文化高峰之间的一段历史时期<sup>[11]</sup>。17世纪末德国史学家凯列尔在其所著世界史中，第一次把人类的全部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3个时期，中世纪没有绝对的时间界限。目前普遍比较接受的观点是从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之前的这段时间。像《欧洲中世纪简史》、《世界文明史》、《全球通史》等书的作者在划定限时时，下限

都是15世纪。而《质》文没有作任何交代，没有给出任何理论依据，就将西方中世纪的下限定在公元1350年，显然有违学术严谨。同时，中世纪在西方是一个很独特的年代，它处于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和近代之间。正因为《质》文没有区分详细界定中世纪的时间范围，将中世纪与西方的古代混为一谈，才得出了诸多错误的结论。

其次，《质》文指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一个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老的过程，都会依次经历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后工业文化三种文化形态”。虽然斯氏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一个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老的过程”，但是，他并没有将文化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老的过程与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后工业文化相联系起来。事实上，在斯氏写《西方的没落》时，还处于20世纪初期，他还根本无法预料到以知识经济为根本特征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直到半个世纪以后，丹尼尔·贝尔才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对后工业社会的特征进行了阐述。很显然，为便于自己论述的需要，《质》文将斯氏的文化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老的过程，硬性地贴上了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后工业文化的“标签”，以武断的手法，强行使斯氏的理论与自己的论述相联系起来，削履适足。而这个“履”，恰恰就是《质》文立论的理论框架，为了研究需要而改变了理论框架，明显存在着“硬伤”。

## 5 明辨、承认中西体育文化之间的差异，有利于我国传统体育的保护与发展

进行中西体育文化的比较，其根本目的不仅要寻找两者的相似点，更要明辨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文化上有差异，才有交流的可能，才有交流的必要。两个中国人切磋武艺，结果不外乎交了朋友，增进了武术技艺；然而，一个懂武术但不懂网球的中国人和一个不懂武术，但精通网球的西班牙人进行交流，结果是，中国人不仅会武术，还学会了打网球。这就是文化交流的魅力。表现在体育交流上，中国人和西班牙人的交流发生了增值效应。因此，应该实事求是地明辨中西体育文化之间的差异，勇于承认这种差异。

经济全球化带来体育全球化，准确地说，是西方体育的全球化，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与民族的体育在价值观念、在比赛规则、在制度等多方面向西方体育看齐，以西方体育崇尚的价值观为“坐标”。西方体育的全球化带来的是世界体育文化形态单一化的危机，一些民族体育，在全球化的轨道上，被西方体育碾得粉

碎。中国的民族体育也面临着被挤压、被排斥的危机。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显得异常艰难，也备受人关注。中国传统体育中蕴含着许多优秀的成分，特别是在身体活动形式上，它突破了西方体育无限外在索取的方式，表现为内在超越，这种内在超越在保持个体健康，特别是对抗外在索取的过度，修护肌体外在索取中的伤病、肌体功能锻炼的单一性等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在西方体育全球化的今天，需要保护，也需要发展。但是，我国传统体育的发展绝不能纳入到西方体育的发展轨道上，如果将武术、太极也改成具有“直接对抗”和“简洁评判”两大基本特征的现代体育形态，向西方体育靠拢，武术、太极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就发生了转变，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武术和太极必将走向灭亡。所以，进行中西体育文化比较，明确二者之间的差异，勇于承认差异，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发展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而不至于在西方体育全球化的“迷雾”中迷失方向，不至于走向覆灭的“悬崖”。

## 参考文献：

- [1] 万义，白晋湘.对“中西体育文化差异论”的质疑[J].体育学刊，2007，14(2)：124-126.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06.
- [3] 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7.
- [4] 李力研.野蛮的文明——体育的哲学宣言[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86，22.
- [5] 谭华.体育史(诸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 [6] 朱光潜.朱光潜谈美[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6：125.
- [7] 李力研.解读体育文化：21世纪奥运大讲堂[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79-81，209.
- [8] 华章.欧洲文明的起源——希腊艺术(在牛津读经典)[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92.
- [9] 张志伟.写给大众的西方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37.
- [10] 田薇.信仰与理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兴衰[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